

读懂英雄观与人民史观的内在统一

□ 王 强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民英雄、英雄精神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围绕“谁是英雄”“怎样成为英雄”和“如何对待英雄”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新时代的英雄观的核心内容。新时代的英雄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史观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的英雄观与人民史观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根本立场都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方法，它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则是这一矛盾运动的主体。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人民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直接体现，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真正生产者。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史观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更是一种价值观，它要求我们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去认识、评价和推动历史发展。

新时代的英雄观深刻融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许许多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与传统英雄主义相比较，新时代的英雄观更关注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贡献的“平凡英雄”们，这些“平凡英雄”们身上所体现的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正是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主动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最生动写照。

可见，新时代的英雄观与人民史观在根本立场上是高度统一的，人民史观阐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地位，新时代的英雄观则将这一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告诉我们英雄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二者共同构成了历



●**核心观点：**人民史观为新时代的英雄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坐标，新时代的英雄观则是人民史观在新时代表达的具体形式和精神体现，新时代的英雄观与人民史观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

史唯物主义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具体表现。

价值取向都是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至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史观与新时代的英雄观，都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民史观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考察和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以人民的福祉为标尺，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正义与非正义。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历史智慧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人民史观也告诉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伟大创造，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充分尊重人民、依靠人民，才能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以人民为中心同样也是新时代的英雄观的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脱贫攻坚战中的基层干部，保家卫国的边防战士，还是默默奉献的人民教师，都涌现出一大批在各行各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这些新时代的英雄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至上”的理念，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英雄“我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

新時代英雄的先進事跡，是人民史觀在當代最生動的注腳。來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的英雄觀與人民史觀共同的最髙價值追求。

实践指向都是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新時代英雄的先進事跡，是人民史觀在當代最生動的注腳。來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的英雄觀與人民史觀共同的最髙價值追求。

在多维传播中深化历史记忆

□ 孙美琳

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核心纽带，国家仪式则是传播和深化这一记忆的重要载体。作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国家仪式，阅兵式不仅展示国家军事实力，更是构建历史记忆的关键场域。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阅兵在吉隆隆重举行。其间，媒介传播创新性地将历史的内涵与时代的形式有机结合，通过官方媒介叙事、新媒体互动扩散、线下社群参与以及国际传播策略的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起一个多维度的传播网络，使人们重温历史记忆，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情感动员与仪式建构

官方媒介在国家重大仪式的传播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和解说词文本，构建一种权威叙事，强化仪式的情感动员效果。

80响礼炮象征胜利80周年，26架直升机组成“80”字样，3架直升机分列悬挂“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条幅……这些视觉符号通过特写、航拍和慢镜头等电视语言的强化，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受阅官兵“精准坚定的步伐，挺拔威武的身姿”，诠释着“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人民军队形象，更将人民形象与历史记忆紧密关联。再比如，解说词“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国旗升起的地方，从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这条路，历经千辛万苦，这条路，克服千难万险”，这种高度文化化和情感化的解说文本，以天然内在的情感动员机制将阅兵式从单纯的军事展示提升为一场历史对话仪式。

精心选择历史元素，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比

如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突出了中国的牺牲和贡献，强化了历史记忆的完整性。从“小米加步枪”到“体系化亮相”的强军叙事，使观众感受到国家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二次创作与情感共鸣

新媒体平台作为阅兵式记忆传播的“第二现场”，通过互动性扩散机制吸引全民参与和情感共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通过专业内容生态构建和创作激励计划，将阅兵仪式从国家盛事转化为全民参与的爱國表达。

以主流资讯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汇聚权威媒体、军事机构和专业博主，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阅兵内容传播生态。权威媒体内容首发和专业博主深度解读相结合，共同构建丰富多元的内容生态。专业博主将军事术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兴趣内容，不仅为军事爱好者提供了深度了解阅兵装备的窗口，而且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影响力账号主动发起的多元互动活动，同样激励用户参与阅兵内容的创作和传播。比如微博军事发起的“九三阅兵百万创作激励计划”，通过内容产出、合作策略及运营资源等方面的扶持，鼓励创作者围绕阅兵盛典进行多元解读与互动分享，助力打造具有全平台影响力的军事内容生态，共同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

这种参与式的互动式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共振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国家叙事与个人体验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阅兵式的记忆传播超越政治宣传的范畴，成为一种共生共享的情感体验，不仅获得信息而且激发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最大限度提

升历史记忆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集体观看与代际传承

线下社群的集体观看和家庭讨论，以参与式记忆机制强化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和地域根植性。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观看活动，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体验，增强了记忆的情感强度和持久性。

学校是阅兵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校园里的仪式化体验将历史记忆与情感反应紧密结合，容易对青少年群体产生深度启蒙作用，进而将历史记忆深植于青少年心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域社群通过阅兵式观看活动，强化历史记忆与地域身份的连接。比如，承载着特殊的抗战记忆的卢沟桥所在地，党员干部代表和居民代表共同观看阅兵式直播。地域身份与历史记忆的交织，使收看阅兵式成为一种强化地域认同和历史意识的实践。退役军人尤其是抗战老兵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则扮演着记忆传承人的角色，他们共同观看阅兵式实际也构成一种代际对话，不同代际的退役军人通过阅兵式实现历史记忆的传递，进一步强化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

阅兵式的国际传播面临着文化差异、政治偏见和地缘政治竞争等多重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主动设置议程，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相比以往对中国阅兵的报道，九三阅兵后外媒的报道态度发生显著变化。西方媒体如CNN、NBC、

价值坐标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人民史观为新时代的英雄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坐标。人民史观使我们真正了解“何谓英雄”。人民史观强调“英雄为了人民”，指的是人民是英雄的创造者，是孕育英雄的土壤，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缩影，也就是说，英雄并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独特存在，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人民史观强调“英雄为了人民”，指的是新时代英雄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超凡脱俗的个人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将个人理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宏伟事业紧密结合。在人民史观下，是否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是衡量英雄的唯一价值尺度。

新時代的英雄觀則是人民史觀在新时代表达的具体形式和精神体现。一个社会的英雄观，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新时代以来我们大力弘扬的爱国奉献、敬业担当、创新创造等英雄精神，正是对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集体意志的集中凝练和升华。英雄作为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品质和先进事迹，提供了可见可学的精神标杆，指引方向、凝聚人心、激发斗志。通过学习英雄，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得以增强，从而将抽象的集体力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动力，引导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价值、服务社会，这恰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民史观的生动实践。

总之，新時代的英雄觀與人民史觀是內在統一、相互促進的關係。英雄的產生，離不開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时代的需求，英雄的事迹，也正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具象化表达。当下，深刻理解新時代的英雄觀和人民史觀的理論內涵及其相互關係，對抵制和駁斥個人英雄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各種錯誤論調，團結廣大人民群众投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BBC等均对阅兵式进行了详细报道，且措辞更为客观和谨慎。CNN在阅兵前就进行了持续报道，特别关注了参阅的新型武器装备和现场热情服务的双语志愿者团队。NBC则专题报道了出席阅兵式的抗战老战士，强调了中国对历史记忆的尊重。这种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展示和阅兵活动的透明开放策略。路透社的报道特别指出，中国允许外国记者近距离拍摄参阅装备的细节，这种透明度在同类活动中实属罕见。这种开放态度增强了外媒报道的客观性，使西方媒体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通过邀请国际友人后代和采取精准传播策略，有效设置国际议程。美国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受邀出席阅兵式，既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也传达中国铭记历史、珍视友谊的态度，释放出珍视和平、维护正义、促进团结的明确信号。国际公众对九三阅兵的反应也显示了国际传播效果的变化。社交媒体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纷纷表达了对中国阅兵的赞颂。这些自发的声音表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总之，历史记忆的生命力来自历史的厚重，也来自传播的创新。历史记忆的塑造和传播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官方媒介、新媒体平台、线下社群和国际传播共同构建的阅兵式记忆传播生态系统，通过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国家与世界，实现记忆的意义共享和价值传承，从而使阅兵式从一场单一的军事仪式转变为一场全民参与、全球关注的历史记忆活动，让阅兵式记忆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法治思维着眼全局、保护预期，更具理性。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法治保障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公平竞争是“两个毫不动摇”的内在要求，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需要依托“法治思维”营造。

法治思维能力，首先是一种“规则层面”的思维能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通过产权界定、契约执行、纠纷解决三大核心功能，可以将交易成本压缩至可承受范围，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迄今最为有效、最为理想的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方式。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在产权保护、融资法律环境、国际规则衔接等方面的法律保障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须通过系统性完善法律法规加以解决。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回应了多年来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准入壁垒、融资难融资贵、产权保护不力等突出问题，将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第二章“公平竞争”用6个条款构建起立体化的公平竞争体系，直指实践中各种阻碍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隐性壁垒；第三章“投资融资促进”针对民企“融资贵、融资慢”的顽疾，构建了多渠道促进民营企业融资的机制；第七章“权益保护”针对实践中对民企执法乱象和产权侵害，构建了“事前预防—事中救济—事后修复”全链条保护体系。

以法治思维发展民营经济，先要树立规则意识，通过“立良法”稳定发展预期，为民营经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方针”，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确立为基本原则，从制度层面稳定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预期。

法治思维能力，也是“规律层面”的思维能力。发展民营经济应以权利为本位，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公权力的行使以不侵害私权为边界，如此才能让民营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新”。

市场主体需要的不再是不确定的政策优惠或特殊照顾，而是可以依据明确的规则进行公平竞争。《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一条明确了“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制度”，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制定涉企政策时，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程序，否则政策不得出台。这一程序性规定，从源头上防止了含有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调查或者要求协助调查，应当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这一规定从规则层面遏制了随意执法、重复检查等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现象。烟台在全国首创的“涉企联合检查平台”，建立了“提报匹配、扫码入企、线上检查、结果互认、码上监督”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切实减轻企业的迎检负担，有关经验做法被国办《电子政务工作简报》刊发。

以法治思维发展民营经济，也应通过“强执行”提高法治水平，通过制度约束、技术赋能、监督问责、能力提升的治理框架减少执法中的随意性，避免“运动式”“一刀切”执法，遏制过度执法，确保民营企业不受不公正对待，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实现民营企业“让恒产者有恒心，让创新者有信心”的发展目标。

其次，法治思维能力，也是一种“信仰层面”的思维能力。法治并非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它同时兼具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工具属性的法治关注的是形式、程序和效率；价值属性的法治关注的是实质、道德和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内心尊崇法治，才能行为遵守法律。”法治思维包含对于法理情的境界的深刻把握，以法治划定底线，以人文关怀凝聚共识，打破权力或资本的单一主导，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的生态体系，推动民营经济从“生存型增长”迈向“价值型发展”。

大型企业常常将“收到第三方支付款”作为向中小民营企业支付账款的条件，这种约定就是实践中常见的“背靠背”条款。《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以法律形式禁止背靠背条款，要求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履约。实践中，保护民营企业免受背靠背条款的侵害，并非是要简单禁止这一市场自发形成的风险分配工具，而是要通过司法裁判划定红线，防止其被滥用；政府自身和国企要带头按时付款，营造良好市场风气；提供供应链金融等解决方案，帮助民企应对风险；清理拖欠账款，规范市场秩序，打击恶意拖欠行为。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诚信守约、链条稳定的健康产业生态，这既保护了处于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也保障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和稳定。

以法治思维发展民营经济，最终要通过“尚法治”让民营企业在有温度的法治中感受公平正义，对民营企业给予充分尊重与关怀，提升民营企业对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崇尚。引导企业自身的合规体系建设，鼓励企业成为法治社会的践行者，既有搏击商海的智慧，又有遵纪守法的自觉，还有回馈社会的担当。

法治思维的本质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核心在于以规则的确定性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预期。增强法治思维内在的三种思维能力，将助力民营企业从“野蛮生长”到“规则生长”，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的坚定者。这正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最好诠释。

（作者系烟台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以法治思维赋能民营经济发展

□ 粘凌燕

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治理升级

□ 姜玉欣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现代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成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方向。

内涵式发展意味着城市要从依赖资源投入和规模扩张转向注重内在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本质上是对城市承载力的深度优化。这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主动适应城市工作重心转变，持续加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建设，以回应当前挑战和未来需求。

以**人民至上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由关注“物”转向关注“人”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建设要落脚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因此，城市治理一方面要突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从主要运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转向更加关注居民生活质量的切实提升与价值感获得等细节上，例如要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关注“一老一小”，大力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着力于老旧小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加强口袋公园和街头的“金角银边”建设，优化完善居民“15分钟生活圈”，提升城市生活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另一方面，城市治理也是人民的治理，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都能参与其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尤其伴随

着城市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就业群体的大量涌现，要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下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将管理与服务有机融合，营造和谐有序的城市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共同推进城市由关注物向“扩张转向关注人的发展”。

以**全域韧性筑牢城市治理安全底线**。安全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城市的高聚集性、高空间强度和高技术依赖等特性不断加强，公共安全 and 灾害风险隐患也在增多，有些已经成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障碍。城市风险因素的隐蔽性、复杂性、联动性在增加，这就需要系统性全局性思维来应对。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推进“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主要聚焦老旧管线、超高层建筑等系统性风险点，同时还把自然灾害防治与社会治安防控都纳入了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这一任务框架内。这表明对于城市韧性的认识已经升级和拓展为“全域韧性”。全域韧性强调覆盖空间全域、贯穿治理全链条、统筹多维度风险的系统性应对能力，需要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风险冲击时，在空间、时间、系统三个维度上，都能够提前预警、动态适应以及快速恢复，保障核心功能不瘫痪、生命线系统不中断、社会秩序不混乱。全域韧性是要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系统，在面对风险时，城市各个系统之间能够高效协调、无缝衔接，迅速反应，将风险带来的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继续加强有助于实现全要素联动的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体制，在城市基础设施风险预警和防控、社区层面应急响应以及居民应急避险能力培养等多方面实现全系统的优化升级，加强“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提高城市各个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以**技术适配促进城市治理效能提升**。内涵式发展强调高效集约而非求大求新。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技术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很多便捷的工具和手段，大大提升了城市治理效能，但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唯技术论倾向，盲目跟风上技术、购设备，建平台，高昂的维护费用和低使用率使一些智慧化平台和智能设备沦为“政绩盆景”。对此，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论及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并未过多强调技术应用和技术更新，而是提出要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热线”“解决急难愁盼”。这意味着新阶段城市治理需要会用、善用、活用已有的治理技术手段，要对数字化工具的过度依赖回归对居民需求的有效回应。对于治理而言，合适的就是高效的，所有的技术手段都要始终服务于治理目标和治理需求，而非成为目标本身。持续探索和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以适配的治理、适合的方法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努力促进治理方式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才是现代化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文化赋能增强城市治理内生动力**。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和激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治理